

夏承燾全集

吳蓓 主編

唐宋詞人年譜

浙江古籍出版社



夏承燾全集

吳蓓 主編

唐宋詞人年譜

夏承燾 著

浙江古籍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唐宋詞人年譜 / 夏承燾著. —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 2017. 4

(夏承燾全集)

ISBN 978-7-5540-0713-6

I. ①唐… II. ①夏… III. ①詞人—年譜—中國—唐宋時期 IV. ①K825. 6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5)第 268693 號

浙江歷史文化研究中心學術成果

唐宋詞人年譜

夏承燾 著

出版發行 浙江古籍出版社

(杭州市體育場路 347 號 郵編:310006)

網 址 www.zjguji.com

責任編輯 陳小林

封面設計 劉 欣

責任校對 余 宏

責任印務 樓浩凱

照 排 浙江時代出版服務有限公司

印 刷 浙江海虹彩色印務有限公司

開 本 850mm×1168mm 1/32

印 張 19.75

字 數 400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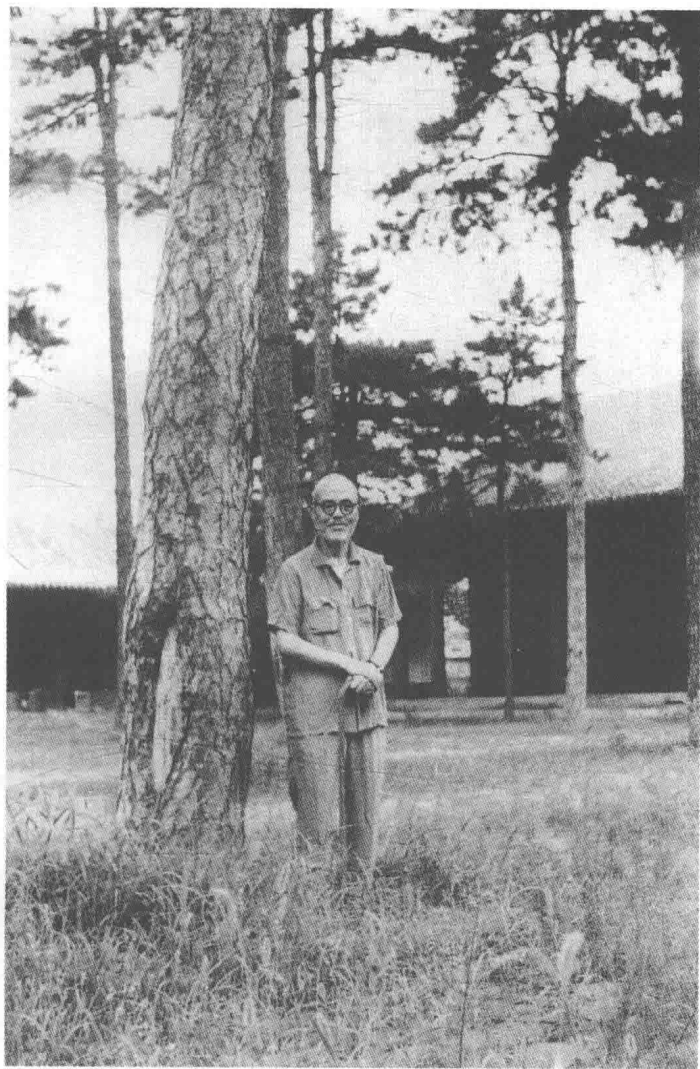
書 號 ISBN 978-7-5540-0713-6

定 價 60.00 圓

如發現印裝質量問題,影響閱讀,請與市場營銷部聯繫調換。



夏承燾先生(1900—1986)



晚年攝于北京



1961 年在上海與郭紹虞(中右)、錢仲聯(右)、馬茂元(左)合作編書



1961 年秋與陳方恪、錢南揚攝于南京小倉山袁枚墓下

先生名時字務觀號放翁

宋史本傳

別稱九曲老樵

文集

三十五書二公事

笠澤漁隱

文三十六跋景福所書永銘跋即公廟詩

同志跋生忘論寧漁隱子跋老子道經注古文寧漁隱笠澤老漁

文三十七跋郭伯道書

可齋

文三六跋歷代陵名跋後山居士詩

通鑑

文三十八跋開河集

稱大昕十駕齋書到錄

四

游觀之觀去聲秦觀字少游陸

游字務觀皆去聲也王景文詩直有自下平生事不了山陰

山陰陸務觀放翁見之笑曰知字務觀乃去聲以何把做

王說出矣
景安居梅雨詩中
陸放翁名務觀
說去聲字則望
文三十八跋開河集

《夏承燾全集》整理委員會

顧問：

吳熊和

吳戰壘

吳常雲

周篤文

施議對

沈松勤

陳銘 陸堅 朱宏達

主編：吳蓓

副主編：李劍亮 陶然 黃傑 錢之江

委員（以筆畫為序）：李保陽 李越深 李寒晴 李劍亮 吳敢

吳晶 吳蓓 何勇強 谷輝之 宋雪玲 金一平 金燦燦

孟國棟 俞強 徐晉如 陸蓓容 陶然 黃傑 張萍

路偉 鄭績 劉斌 潘丕秀 錢之江

錄稿（以筆畫為序）：何振 袁恩東 徐小憶 黃寶芯 彭穎琪

趙益三 蔡思超 蔡國強 劉含之 羅舒敏 羅愷文

《夏承燾全集》前言

夏承燾先生是中國現代著名的詞學家、教育家。畢生致力於詞學研究和教學，是現代詞學的開拓者和奠基人，有『一代詞宗』、『詞學宗師』的美譽。一生治學勤奮，著述宏富。一系列經典著作是詞學史上的里程碑，也是二十世紀優秀的學術成果和文化成果。著作流播中外，幾十年來沾溉學界及詩詞愛好者良多，爲無數的後學開啟了治學法門，也爲詩詞文化的普及與傳播做出了傑出的貢獻。爲更好地繼承和發揚這份文化遺產，擴大中華詞學的影響力，我們在八卷本《夏承燾集》的基礎上，彙集未經出版的夏承燾先生手稿以及多方搜羅的散篇、書信等都爲全集，以饗讀者。茲就夏承燾先生學術的淵源背景、主要貢獻、全集的價值意義以及全集編纂情況等略作闡述和介紹。

壹

夏承燾（一九〇〇—一九八六），字瞿禪，晚號瞿髯，浙江永嘉（今溫州市）人。一九一八年畢業於溫州師範學校，在任橋小學、溫州布業國民小學任教。一九二一年七月赴北京

任《民意報》副刊編輯，同年冬往陝西教育廳任職，一九二二年在西安中學任教。一九二四年冬離西安返家完婚，次年初再度西行入秦，四月兼任西北大學國文講席。七月返溫，任教於甌海公學、溫州第十中學、女子中學。一九二七年二月至三月，曾在國民革命軍浙江省防軍秘書處短暫工作。隨後在寧波第四中學、嚴州第九中學任教。一九三〇年秋始任教於之江大學。一九三七年抗日戰爭爆發，年末避寇返里。一九三八年八月末抵上海繼任之江大學教席（時之江大學遷滬復課），一九三九年兼任無錫國學專科學校和太炎文學院教席。一九四〇年任之江大學國文系代主任。一九四二年上海淪陷後，先後在雁蕩山樂清師範、溫州中學任教，年底赴浙江大學龍泉分校任教。一九五二年浙大院系調整後，任浙江師範學院中文系主任。一九五八年浙江師範學院改爲杭州大學，任中文系教授兼語文教研室主任。一九六三年曾在北京大學、北京師範大學講詞學。一九七二年後病假長休。一九七五年七月末離杭赴京調養。一九七九年以後爲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特約研究員和《文學評論》雜誌編委。一九八六年逝世於北京。

夏承燾先生前半生經歷晚清民國，這是一個天崩地解、社會轉型的時代，學術界因受西方近代文明的衝擊，力爭突破傳統的窠臼而求自新，歷代學術，舉凡先秦諸子、兩漢經學、宋明理學乃至有清一代的學術，都被一一翻檢審視，新舊中西，錯綜交錯，學術思想因此而極爲活躍。夏承燾先生的道德學問，也不可避免地帶有時代的烙印。青年時代的他，

曾對陽明心學、關學、諸子學、小學、史地學等等，發生了廣泛的興趣。自然，對兩浙學術地源性傳承的經史之學，更是一度表現出了儒生本色的熱衷。

以一九二七年末夏承燾先生開始研治詞學爲界，此前的十幾年，從入讀浙江省立溫州師範學院，到畢業任教、北上西遊、回鄉求職，皆可視爲其藏修階段。

夏承燾先生出身普通商人家庭，雖無家學淵源，却自小勤奮向學，中學時代起，便曾熟背除《爾雅》之外的十三經，打下了扎實的國學基礎。青年時期，更是博覽群書，一面繼續背誦經學原典，一面大量閱讀四部文獻。同時敏銳捕捉學術動向，在中西新舊的交錯中，努力汲取多種滋養。在西安，他曾癡迷於王陽明心學而發意研治性理。陽明學說儘管在清初被實學家所批判，但它的影響却十分深遠。自陽明學後，儒家似乎已經不再把『道的實現完全寄託在以『聖君』行使權力中心的政治建制上面，而是把先天妙道通貫到日用常行，對象遍及『愚夫愚婦』。這是儒家由上到下、由聖君賢相到普通百姓、由面向朝廷到面向社會所發生的一種重心的轉移。年輕的夏承燾先生讀王陽明而至於激動到『繞室狂走』，足見陽明學說幾百年來對知識分子心靈的震撼程度。王陽明之後，另一位激起夏承燾先生強烈震動的思想家是顏元（習齋）。顏元與他的學生李塏主張『實文、實行、實體、實用』，人稱『顏李學派』。這是清初把經世致用的思想發揮到極致，並且自成統系的一個流派。顏氏與王氏，一實一空，都被西安時期的夏承燾先生統一在他的以《省身格》爲代

表的日常生活化的儒家內修之課中。如果說，性理學給予夏承燾先生以靈動之思從而有助於他的詩性詞情的話，那麼實學對於他最大的影響除『實文』外，恐怕還數『實行』。而無論清初顏李實學，抑或產自夏氏祖籍的永嘉實學，它們作用於夏承燾先生的，更多的似乎不在於事功經濟思想，而在於務實、敏行的行為方式。這兩者對於成就他的詩詞創作以及催生大量的學術成果而言，當為不虛的潛在因由。

西安時期，夏承燾先生對小學、諸子學也費力頗多。小學作為研經的基礎，得到夏承燾先生的重視原是儒生學問格局中的應有之義。許慎的《說文解字》及段玉裁的《說文注》，數年間成為他堅持不輟的精讀日課。閱讀過程中，曾劄有《段氏說文釋例》一本、《簡名編》兩本、《正名編》兩本、《假借編》及《引申編》三本、《筆樸》一本、許書字義有關於人生哲學者一本，共得劄記十本之多（手稿現存溫州市圖書館）。回溫州後，繼續通讀各家研治《說文解字》的專著，曾繪製《各家〈說文〉書作表》，分門別類地列舉了七八家七十三種之多，除此之外，尚有如王夫之的《說文廣義》、孔廣居的《說文疑疑》、馮鼎調的《六書準》、潘肇豐的《六書會原》等，因『皆未脫宋元明人鄉壁虛造之陋習。不錄』。他還曾作《說文通論》、《說文廣例》等。總之，儼然治《說文》的專家裏手。諸子之學興盛於春秋戰國，後由於儒學逐漸定於一尊而日趨消歇；明末隨著儒家思想一統局面的鬆動，思想家李贄等人開始重新宣導諸子學說，子學開始引起人們的興趣；清代考據學興盛，由於考

證六經以及三代歷史的需要，先秦諸子成爲證經、證史的重要旁證；晚清民國，在許多學者的大力提倡下，子學開始在西學的映照下而彰顯其多元的價值，不僅走出了『異端』的境遇，而且彰顯一時，成爲近代新學的重要組成部分。這個學術背景，顯然影響到了夏承燾先生，他遍讀諸子，認真作了讀書劄記，有《慎子》、《尹文子》、《公孫龍子》、《呂氏春秋》劄記一本，《揚子法言》劄記一本，手稿今存於溫州市圖書館。他所作的《荀子界說》，更是超乎一般的讀書筆記之上，具有一定的學術性。

一九二五年秋，夏承燾先生從西安回到溫州，爲方便讀書，移家到現溫州圖書館前身舊溫屬六縣聯立籀園圖書館附近。用兩年的時間，遍閱籀園九萬餘卷藏書（以經部居多）。一九二七年下半年，赴嚴州九中任教，又得以恣讀原州府書院的二十四史等藏書，對史學的興趣有增無減。中國現代學術中，史學一門可謂人才濟濟，最見實績。其中浙東史學，貢獻尤大。梁啟超的《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清代學術概論》、《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諸作，開啟了現代史學中學術史一目的端緒。梁氏之書，對夏承燾先生產生了不小的影響，他後來專治詞學，就頗以學術史的理路來構築詞學研究的系統。在西北大學時，夏承燾先生曾講授章學誠《文史通議》，編《史學外之章學誠》作爲講義，打算合章氏與劉知幾、鄭樵三人作《中國三大史學家之研究》一書。回溫州後，曾撰成《五代史記劄記》。嚴州任教期間，發願編撰《中國學者（術）地表》，『此書成，可推求某地域、某學派發

生及盛衰之故』（此書稿本，見於二〇一五年西泠印社秋季拍賣會上，內粗列各地域學者名錄，眉目略見，而格局未成）。

從十年藏修的經歷來看，青年時代的夏承燾先生，其理想與抱負，是頗以清儒爲模範的：治群經子史，以爲經世濟時之用；一面『尊德性』，講究道德修養，一面『道問學』，熱衷學問考究。然而，正如時代的風雲變幻使清儒濟世的宏大希冀漸次破滅而專意於學問一樣，將近而立的夏承燾先生，也面臨著術業的抉擇。一九二七年四月，蔣介石國民政府成立。內戰頻仍，時局不穩，讓夏承燾先生深感『事功非所望』，於是決意維護書生本色，靠做學問而謀生。究竟以何種學問謀生計、遣生涯？他思忖再三，認爲『惟小學及詞，稍可自勉』。於是，在這一年的年尾，他做了一個階段性的打算：『擬以四五年功夫專精學詞。』（一九二七年十月四日日記）此後又續了十年期約。儘管在續期內，他也依然心有旁騖，幻想回到『大者遠者』的治經治史的『正途』上去，但終究敵不過內心真實的興趣愛好與世易時移下職事觀念的變化所縮合而成的魔力，到底與詞學締結了一生的不解之緣。

詞學對應於當時的時代律動是這樣一個情形。清末民初，傳統的四部之學在西學的衝擊下，分類格局發生了動搖，學者分科分類的意識日益突出，中國現代學術，呈現出由務博的通人之學（如嚴復、康有爲、梁啟超、章太炎、王國維）轉向專精的專家之學（如現代史學重鎮陳寅恪、陳垣）的特點。社會情境也隨之而變，二十年代初，南北各地的高校出現

了越來越多的以講授詞學爲職志的學者，如北京俞平伯、吳世昌、劉毓盤，南京吳梅、盧前、陳匪石、唐圭璋，上海龍沐勛、江蘇任二北等。在這樣的背景下，夏承燾先生與他的詞學，也順理成章地成爲了這個由新學科與新專業而構成的新棋盤中的浙江方面的代表。這自然是夏承燾先生後來難以脫離詞學軌跡的一個重要的社會客觀因素。從學術背景與學術個體的關係來看，一方面，現代學術的轉型，促成了夏承燾先生由通入精，鍥而不舍，在詞人年譜、詞史、詞樂、詞律、詞韻、詞籍箋校整理及詞論、鑒賞諸方面均取得突破性成果，拓展了詞學研究的疆域，提高了詞學研究的總體水準，促進了詞學向現代轉型。另一方面，在古典文學的研究領域，詞學是最早具備現代學術的架構和體系的專門之學，因此夏承燾先生所代表的詞學，作爲中國現代學術繁榮昌盛的有機組成部分，實具有特殊的學術價值與研究價值。而這個關係的視點，過去似一直未被學術界所關注和認知。

未到而立之年的夏承燾先生，甫一轉到詞學，便表現出非凡的大家氣度。自一九二七年十月四日打定主意治詞後，才過一月，他已經『搜集歷代詞話竟』，並擬定計劃作四書：《中國詞學史》（或《詞學批評史》）、《歷代名家詞評》、《歷代詞話選》、《名家論詞書牘》（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一日）。不到兩月，他又修訂計劃，要作《詞學考》、《歷代詞人傳》、《詞學史》、《詞林續事》、《詞林年表》、《學詞問話》（見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一日日記及眉批）。《詞學考》之一的《詞樂考》所擬綱目，包括源流考、樂器考、制曲考、大晟樂府考、樂

工歌妓考、譜字考、詞譜考等內容。這個計劃之所以引起我們高度關注，是因為它關涉到現代詞學的體系建構問題。詞學界每將現代詞學學科體系的理論構建上溯至龍沐勛先生發表於一九三四年四月的《研究詞學之商榷》一文，認為這篇文章提出詞學研究的八個方面：圖譜之學、音律之學、詞韻之學、詞史之學、校勘之學以及聲調之學、批評之學、目錄之學，正式界定了詞學內涵。我們看到，夏承燾先生於一九二七年底擬定的詞學計劃，實已大體涵蓋了這些方面。到一九三五年，夏承燾先生又擬在《詞學考》基礎上分撰《詞學史》、《詞學志》、《詞學典》、《詞學譜表》四部巨著。一九三九年底，四書擴為六書：《詞史》、《詞史表》、《詞人行實及年譜》、《詞例》、《詞籍考》、《詞樂考》。這些計劃，雖然有些未能完成，但其構想和思路，實已奠定了現代詞學研究的基本格局。因此，與其說現代詞學的體系構築成於某人之手，不如說，它是那個時代夏承燾、龍沐勛、唐圭璋先生等精英們相互切磋、相互影響所達成的共識。只不過，龍先生將之理論化，而夏承燾先生呢，更多地付諸於實踐。除制定詞學規劃外，自一九二八年起，夏承燾先生的代表作《唐宋詞人年譜》的諸種單譜源源不斷地撰寫出來；對姜夔詞樂、樂譜的考證也成果迭出；另一部重要著作《詞例》也在著手編集之中；一九三一年十二月《燕京學報》第十二期刊登他的第一篇詞學論文《白石歌曲旁譜辨》，也是他的成名作；一九三三年龍沐勛先生主編的《詞學季刊》創刊，夏先生成為該陣地的三大主力之一。總之，夏承燾先生不僅在涉足詞

壇的第一時間構築了龐大的詞學規劃，其詞學成果也在短短幾年內噴薄而出，這兩者的格局和質地，不僅使他迅速成為詞壇的領軍人物，也為現代詞學做了堅實的奠基。程千帆先生巨眼洞悉夏氏詞學成就之因：『以清儒治群經子史之法治詞，舉凡校勘、目錄、版本、箋注、考證之術，無不採用……當世學林，殆無與抗手者。』的確，經史之術便是夏氏詞學的點金術。

夏承燾先生晚年總結自己的治詞經驗時說：『我自師校畢業後，因為家庭經濟等各方面條件的限制，未能繼續升學，苦無名師指點，才走了一段彎路，花費了將近十年的探索時間。』這種認識恐不足為憑。相反，十年研治經史、諸子、小學的經歷，不僅使夏承燾先生對中國學術文化的淵源流變有了較為深入的瞭解，也使他掌握了校勘、目錄、版本、箋注、考證等傳統治學方法。簡單說來，志、典、譜、表，都是史學方法，而考、注、疏、箋，則都是經學長術。從夏承燾先生早年的詞學構架《詞林繫年》《詞學志》《詞學典》《詞學譜表》《詞學考》裏，以及詞學成果《唐宋詞人年譜》《姜白石詞編年箋注》中，經史之法都昭然若揭。因此，以經史之術別立詞學，正是夏承燾先生快速成名的奧妙所在，而他所藉以構築現代詞學堂廡的手法，並非某些人意會的西學之方，而恰恰是騰挪自傳統的經史之術。這是我們審視現代詞學構築元素的一個奇妙的點，也是我們藉以反省中國現代學術的一個有味道的出發場域。